

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新考辨

闫化川

碧霞元君的封号问题是当前学术界对其神信仰研究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对“碧霞元君”封号的有无、碧霞元君信仰的滥觞及其正式兴起的时间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辨，并认为明代正德二年（1507）是碧霞元君信仰正式从民间私祀成为国家认可之神的标志性时间。

关键词：碧霞元君 封号 碧霞元君信仰

作者闫化川，1974年生，历史学博士，山东省滨州市社科联副调研员。

碧霞元君信仰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京津等广大北方地区，是信徒众多、香火颇盛的一种民间信仰。碧霞元君是发祥于山东的一位女神，自其发祥以来长期处于一种民间“私祀”的发展状态，但由于其在明代正德二年（1507）受到明武宗朱厚照的遣使祭拜，这是历代帝王中对碧霞元君进行祭祀的第一次，标志着碧霞元君信仰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成为官方正式认可的民间信仰之一。其后碧霞元君信仰很快成为中国北方广大民众心目中地位极高的一尊女神，与南方的妈祖并称为“中国一北一南的两大女神”。关于碧霞元君信仰的研究，有过20世纪20、30年代与90年代前后这两次学术研究的高潮。1925年，顾颉刚等人对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香会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被认为是“中国民俗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件”。1929年，顾颉刚、魏建功、罗香林等人进行了第二次田野调查，发表了一些碧霞元君研究的文章，其中罗香林的《碧霞元君》一文“堪称当时碧霞元君研究之第一人”。^①建国后，在国家“破除迷信”的号召下，民间信仰及其相关的研究便“无从谈起”，“再也无人问津”。^②20世纪90年代前后，一些关于碧霞元君研究的文章又陆续问世，^③标志着碧霞元君研究的高潮再次到

^① 田承军：《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载《史学月刊》2004年4期，80页。

^② 王健：《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载《史学月刊》2005年1期，123页。

^③ 这些文章，大致有：范恩君《论碧霞元君信仰》，载《中国道教》1995年2期；刘守华《论碧霞元君形象的演化及其文化内涵》，载刘锡诚《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一书；邢莉《碧霞元君——道教的女神》，载《中国道教》1998年3期；吴效群《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妙峰山庙会》，载《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1期；车锡伦《泰山女神的神话、信仰与宗教》，载《岱宗学刊》2001年1期；成淑君《自是神人同爱国，岁输百万佐太平——明代泰山碧霞元君灵应宫香客经济初探》，代洪亮《社会记忆的空间——以清代山东碧霞元君信仰为中心》，均载《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3期。

来。但是，这些研究迄今并未能够解决一些诸如碧霞元君封号有无、碧霞元君信仰的源起时间等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力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一、宋真宗未封“碧霞元君”

泰山岱顶的碧霞元君庙，建于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6)，最初称为“昭应观”，明成化间赐额“碧霞灵应宫”。但是，何时出现了“碧霞元君”这一名号以及宋真宗是否曾加封“碧霞元君”，却语焉不详。雍正《山东通志》卷21《秩祀志》记载：

碧霞元君庙，在泰山顶玉女池侧，宋真宗东封，王钦若设醴泉于玉女池，帝嘉异之。池侧在玉女像，像颇摧折，诏易以玉石，复砬石为龕，建祠祀之。初名昭真观，明成化间赐额曰碧霞灵应宫，国朝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仁皇帝赐匾曰坤元叶应，雍正七年发帑重修。又一祠在府城西南二里许，今称灵应宫，即宋之天书观也。

元君是道教对女仙的尊称，如“紫虚元君南岳夫人”、“紫虚元君魏夫人”，^①据说“黄帝、老子皆受要于泰壹元君……”。^②而所谓“元君庙”，也早在唐代便已有创建，据《县册》记载，如陕西西安府的长安县，有一座元君庙“在县北三十里冯党里，创自唐代，本朝康熙六十年重修”。在三原县“县南门外”和“丁留村”，各有一座元君庙，据《县志》记载，“俱明洪武间修”。^③陕西还有一座“太一元君庙”，祷雨有应。^④

历史上究竟曾否有过“碧霞元君”之封号？考诸各种官、私文献资料，始终未能发现关于“碧霞元君”之封号的明确史料记载。至于所谓的宋真宗加封泰山玉女“碧霞元君”封号的说法，《长编》、《文献通考》、《宋会要》、《宋史》等史籍均无相应记载。

据[明]王世贞《游泰山记》记载：

余自戊午己未间有事于泰山者三，……曰天门。既上，……行可里许，为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即华山玉女也，天下之祝厘祈福者趋焉。祠宇颇瑰伟，而岁所入香缙以万计。……其右……一石池，纵广及深俱二尺许，亦曰玉女洗头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许曰岳帝祠，陋不能胜香火……余去兹役十有七年矣，而所经睹若夙夕会。至自太和有所撰述，因并记之。……^⑤

王世贞这篇《游泰山记》说是在“戊午己未间”游泰山所作，其生平经历了两个“戊午己未间”，一是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己未（1559），一是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己未（1619），根据其文后“去兹役十有七年”、“至自太和有所撰述”，大概是其在“母忧归”后所作，即似应在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六月游泰山。

王世贞当时对于“碧霞元君”封号“不知其所由始”的记载，说明他对宋真宗加封

^① [宋]欧阳修：《唐书》卷59〈艺文志第49〉记载：范邈《紫虚元君南岳夫人内传》，一卷；项宗《紫虚元君魏夫人内传》，一卷。

^② [宋]罗泌：《路史》卷3《前纪三·循蜚纪·泰壹氏》，四库本。

^③ 雍正《陕西通志》卷28《祠祀一·寺观附》，四库本。

^④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6〈序·诏使祷雨诗序〉，四库本。

^⑤ 雍正《山东通志》卷35之19下〈艺文志十九·记下〉。

泰山玉女“碧霞元君”封号的说法并不认可。王世贞之前的明代学者孙绪，其约作于明嘉靖六年（1527）的《新建碧霞元君行祠記》一文曰：

岱宗之望，肇自唐虞封禅之典，增崇累代。泰山有祠，其来远矣，独其巔祠所谓碧霞元君者，不见口籍，然楮泉之盛，人心归依，竦愿之诚，天下之祠莫加焉。间尝思之，閭閻昏夜牝晨者，十九狡巫黠史，欲惊物骇俗，恒先惑妇女以为之地，彼既惑，则夫正位乎外者可颐指矣。阴性專执吝嗇，喜右其属类，闻圣母天妃蚕娘龙女仙姬小姑之说，喑喑慕悦，然不知黠狡者饰其属以歆之也，故凡女郎祠比他祠独盛。人情履险则惧而悔过，妇女柔脆，尤易惧。泰山嶮巇危峻，以柔脆之质卒然值之，神丧胆落，孤峰絕壑，山灵顾盼，如在业缘，罪戾方无地解脱，彼端拱者，吾属也，何修何为尊崇若此。苟可以得欢心博佑庇，体肤不敢爱，况簪珥珠璫之属邪。故元君祠比他女郎为尤盛。作俑者计亦巧矣，岁久惑益深，村墟市镇随在有祠，燕赵魏博之间櫜楠相望。……^①

孙绪此文明确指出：碧霞元君之封号史无记载。碧霞元君其神的封号，是一些“作俑者”巧妙筹划设计的结果。由于这些“作俑者”的推波助澜，使得本来局限一隅的碧霞元君信仰很快发展起来，渐渐成为了一个影响浩大的民间信仰，并逐渐得到了皇室贵族等上层社会的青睐和推崇，由此愈发推动了碧霞元君信仰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王世贞之后的明代学者张萱认为：

海内神祠惟泰山碧霞元君最盛，然世莫详神所自出。余阅马端临《通考》：“泰山絕顶，故有玉女池，池侧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浊。宋真宗登封，先营顿置，泉忽涌出，清泚可鉴，味甚甘美。王钦若请浚治之，像颇摧折，诏易以玉石。既成，上与近臣临观，复砬石为龕，祭焉。”及考李谔《瑶池记》谓：“黄帝建岱岳观，尝遣女子七人，云冠羽衣奉香火以迎西昆真人……”，则元君或亦七女中之得道而仙者。织女名天孙，而岱岳亦名天孙，岂以此邪。李白游泰山诗：“玉女四五人，飘飘下九垓。”似亦有据，是元君在唐已有之，至宋而香火始盛耳。^②

博览群书的张萱，其上述考辨的贡献在于能较早地指出了“元君”之号始于唐代，这一史料也被后人广泛称引。但是“元君”并不等同于“碧霞元君”，“元君庙”也未必就是供奉“碧霞元君”，因此元君信仰的历史并不是碧霞元君信仰的演变历史；由元君信仰的历史去上溯和推测碧霞元君信仰的演变历史无疑是南辕北辙。而要考察碧霞元君封号的由来，只能将“碧霞元君”这一完整的封号放在一起考察，这样才能够准确地把握碧霞元君信仰的发生、发展历史。从张萱的上述考证可以看出，他的结论是“元君在唐已有之，至宋而香火始盛耳”，是明显地受“元君——碧霞元君——碧霞元君信仰”这一错误程式的误导，从而认为在唐代已经流行的元君信仰就是碧霞元君信仰的第一阶段，至宋代碧霞元君信仰进入了“香火始盛”的阶段。

^① [明]孙绪：《沙溪集》卷4〈新建碧霞元君行祠記〉，四库本。

^② [明]张萱：《疑耀》卷1《泰山神祠》，四库本。旧题李贽作，系伪托。此书皆考证之文，虽有穿凿，要为典贍，盖萱为时尝重编文渊阁书目，多见古图籍也。

张萱虽曰要考察“碧霞元君”之封号的来龙去脉，实际并未能提供“宋真宗封碧霞元君之号”的史料，也就无从谈起解决“碧霞元君之封号何时加封”这一问题。而“元君——碧霞元君——碧霞元君信仰”这一错误程式，仍在继续误导着一些后人。如此后，乾隆皇帝在考证这一问题时作了如下阐述：

……碧霞元君，说者以为黄帝所遣玉女，或以谓是即泰山神女，往往瓜背不合。核之志乘，元君封号肇自有宋大中祥符间，真宗有事东封，以上顶有玉女池，乃易池旁石象为玉，龕而祭之。顾考刘禹锡〈送张炼师还东岳〉诗，有‘久事元君住翠微’之句，是唐以前故有元君之名，不自宋始。彼道藏及诸家所征姓名世系，庸足深辨哉。^①

乾隆皇帝在此重申了张萱“元君之号始于唐代”的结论，认为“元君”之封号，“不自宋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碧霞元君封号、碧霞元君信仰始自何时呢？他也并没有提出多高明的见解和多有说服力的史料证据，只是人云亦云地说“核之志乘”，“肇自有宋大中祥符间”。对这一问题，仍是未能解决。

而孙绪的观点，即碧霞元君封号是一些“作俑者”所为，则被其后的一些学者所继承。如明末的艾南英^②《论宋天地合祭》一文，认为这是道教的杜撰和附会。其文云：

呜呼！始为天地合祭之说也，……而以人神礼之如是，则所谓地者，殆将姑姬其貌，势必至如道家之妄，于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以天妃圣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后已。呜呼！何其鄙诞而不经欤。^③

这就明确地说明：碧霞元君封号的那些“作俑者”，是“道家之妄”、“鄙诞不经”的附会和杜撰。笔者认为“碧霞元君”之封号并非宋真宗所封，而是系道教附会所为。尽管宋真宗封禅泰山之后，泰山诸神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普遍提升，泰山诸神信仰的社会影响力随之扩大，但这些事实只能证明宋真宗封禅泰山之后碧霞元君信仰也随之发展了，而不能证明宋真宗曾经加封过泰山玉女“碧霞元君”这一封号。而当前学术界对“宋真宗加封泰山玉女为碧霞元君”之事，也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此系道教附会。如中国文化研究所车锡伦先生推断“（碧霞元君）这一封号应是道教所为……”，^④郑丽航女士《天妃附会碧霞元君封号考》亦力持此论。^⑤

^① 《钦定南巡盛典》卷24《天章·御制文·重修碧霞元君庙碑记》，四库本。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14、《明史》卷288《文苑四》记载：艾南英，字千子，东乡人，天启甲子（1624）举人。有讥刺魏忠贤之语而被停三科。庄烈帝即位后，久试不第，而文日有名。后朱聿键僭号于福建，他担任监察御史。明年八月卒于延平。

^③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14所引《明艾南英论宋天地合祭》，四库本。

^④ 车锡伦：《泰山女神的神话、信仰与宗教》，载《岱宗学刊》2001年1期。

^⑤ 载《中华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2004年；120—126页。

二、碧霞元君信仰的溯源

那么,为什么会有“宋真宗加封泰山玉女为碧霞元君”这一说法呢?据查,始作俑者是清代张尔岐《蒿庵闲话》^①卷1所引《帝京景物略》,其文如下:

按稗史:元君者,汉时仁圣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圯像仆,童泐尽,女沦于池。宋真宗东封,还次御帐,涤手池内,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涤之,玉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号为圣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后祠日加广。^②

张尔岐《蒿庵闲话》一书,在记载上是自相矛盾,被认为“前后已自相违异,岂可引以诂经”,颇为时人所讥,故此书在史料考证上并不具有相当的权威价值和较强的说服力。他所引用的“稗史”,即《帝京景物略》,其所云“宋真宗东封,……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就是“宋真宗曾加封碧霞元君之号”之说的最早提出。

《帝京景物略》一书,系明末的刘侗、于奕正撰,^③不但“考据亦多不精确”,而且上引文字还不见于今本。这就让人有些查无对证了。张尔岐是另有所本,还是从别书另外引用上述文字,抑或是个人杜撰,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即便是《帝京景物略》一书有此一说,孙绪的《新建碧霞元君行祠记》一文,也早在明末的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一书之前即已经对此问题提出了疑问。作为后出的《帝京景物略》一书,其史料价值当然不能超过它之前的《新建碧霞元君行祠记》,除非其能够提出新的史料来推翻其前人之论,然而根据以上引文来看,确实是一“稗史”而已,直如小说家言,实不足为信。而张尔岐转引之本无可厚非,其意大概无非是将其作为了一条“闲话”,以增添一些谈资罢了,惜乎后人之不察,竟将此类“闲话”作为考据的依据,殊为遗憾。

而且,与张尔岐生活的朝代大致相当的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1613-1682),居然也持这一观点,认为“碧霞元君”的封号系宋真宗所封。他说:

泰山顶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为泰山之女,后之文人知其说之不经而撰为黄帝遣玉女之事以附会之,不知当日所以褒封,固真以为泰山之女也。今考封号虽自宋时,而泰山女之说则晋时已有之。……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儿。……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禅毕,亲幸加封(泰山三郎)炳灵公。夫封其子为将军为公,则封其女为君,正一时之事尔。又考管子对桓公曰:“东海之子类于龟”,不知何语。而房玄龄注则以为“海神之子”。又元刘遵鲁《漠岛记》曰:

^① [清]张尔岐:《蒿庵闲话》2卷,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是编乃其札记之文,凡二百九十六条。顾炎武与汪琬书自称精于三礼,卓然经师,不及尔岐,故原跋以是编为《日知录》之亚。……然韩婴采掇杂说,前后已自相违异,岂可引以诂经。……”

^② 转引自顾颉刚:《妙峰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③ 《帝京景物略》8卷,明刘侗、于奕正撰。刘侗字同人,麻城人,崇禎甲戌进士,官吴县知县。于奕正字司直,宛平人。此书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是编详载北京景物,……採摭頗疎。……考据亦多不精确,……”对此书的评价并不高。

“庙中神妃，相传为东海广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则山亦有女，曷足怪乎！^①

顾炎武虽然说“考封号自宋时”，但是他实际上并未能提供出任何的关于宋真宗曾经加封过泰山之女为“碧霞元君”这一封号的有力证据。他论证的重点在于：首先是自己先认为“碧霞元君”之封号是宋真宗所封。其次，宋真宗所封的“泰山之女”，当时“固真以为泰山之女也。”其三，“泰山女”之说，“晋时已有”。其四，泰山有儿亦应有女，泰山之女即后来加封的碧霞元君。

因此，他认为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禅结束之后，曾加封泰山之子三郎为“炳灵公”，并据此推断说与此同时，也加封了泰山之女“碧霞元君”的封号。但是为何加封泰山之子三郎之事有史记载，而加封泰山之女“碧霞元君”之事却不见记载？因此顾炎武这一说法看似合理，其实不过想当然罢了。不过，宋真宗加封泰山之女为“碧霞元君”的说法虽然是错误的，但是这一说法却得以流传至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民间的碧霞元君信仰大概就是从宋真宗封禅泰山之后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碧霞元君信仰的发展之初，道家有意识地加以引导、利用，发挥出道教造神、附会的能力来吸引更多的信徒，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碧霞元君信仰的进一步发展，而民间信徒趋之若鹜的香火崇奉又反过来推动了碧霞元君信仰的继续向前发展。因此无论宋真宗是否曾封“碧霞元君”之封号，但在其后碧霞元君信仰便在民间有了更广泛的流传却已成为了事实。

现存的民间关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最早文字记载，大概是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所立的《东岳元君香火社碑》。根据今存于山东省泰安市博物馆岱庙内的《东岳元君香火社碑》拓片，其碑文开头是“碧霞元君香火……”碑文中有“知人命短长”、“山西”等字，其余漫漶剥泐不可识，立碑时间是“大宋辛酉岁冬十月望后”，立碑者有“东阿社”等字。^②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碧霞元君之号的记载。

碑文中的“知人命短长”云云，大概是出自《论衡》卷二《无形篇》：

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犹陶者用土为簠廉，冶者用铜为杵杆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体已定，不可减增。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减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长可得论也。……^③

碑文中的“东阿社”，其中的“东阿”，笔者认为不宜理解为“山东的东阿县”，“东阿社”未必就是“山东东阿县的香火社”的简称，因此立碑者“东阿社”三个字颇值得研究。位于山东省西部、以特产“阿胶”著名的东阿县，是碧霞元君信仰的繁盛之地，据调查，在解放初期东阿县所存的庙宇中，碧霞元君庙竟占 40%。^④但是能否因为东阿

^①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 25，四库本。又，刘遵鲁是山东蓬莱人，但他不是元代人，而据山东地方志记载他是明代人。

^② 这则碑文的拓片，引自田承军：《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载《史学月刊》2004 年 4 期，81 页。但是田承军先生对碑文内容背后所隐藏着的重要史料信息似未予以充分的挖掘，尤其是他认为碑文中的“东阿社”即是“山东的东阿县的香火社”，颇有可商榷之处。

^③ [汉]王充《论衡》卷 2《无形篇》。

^④ 参见张国强：《东阿县泰山奶奶祈愿风俗调查》，载《民俗研究》1991 年 1 期。

县的碧霞元君信仰非常密集而认为早在宋代东阿县便已经派遣了“香火社”去泰山进香并立碑署名为“东阿社”呢？笔者认为不妥。东阿县建置的历史较为久远，一些地方志均对其有所记载，如：

东阿县：（紧南至州五十里）本汉旧县也，春秋时齐之柯地。左传曰公会齐侯于柯，注曰此柯今济北东阿，齐之柯邑犹祝阿也。汉志：东阿县属东郡都尉理，晋属济北国，隋开皇三年属济州，天宝十三载济州废，县属郛州。^①

东平路之东阿县，济南西百二十里齐之柯邑。春秋庄公十三年会齐侯盟于柯，曹沫劫盟于此。汉为东阿县（两汉有阿阳，无东阿，记误。），魏封曹植地，晋属济北国，隋属济北郡，唐初属济州，天宝十三载属郛州，金宋并属东平（有阿井贡胶井，今在闸河之西）。^②

东阿县，周春秋时为齐阿邑，又为小谷邑，秦属东郡，汉置东阿县，属东郡。东汉析置谷城县，与东阿并属东郡。晋并属济北国，南宋北魏并属济北郡，隋东阿属济北郡，唐属郛州，宋属东平府，金因之，元属东平路。明徙治谷城县故城，即今治，隶兖州府。皇清因之，雍正八年属东平直隶州，十三年随州改属泰安府，编户二十四里。^③

据此可知，建县历史悠久的东阿县早在唐宋时就是一个完整的地理概念，作为地名，东阿县可以省略“县”字，即可称之为东阿。但是“东阿县的某某香火社”，却不可能太过简化，甚至简称为“东阿社”。考虑到立碑留念的郑重性，若此所谓“东阿社”是“山东东阿县的香火社”的简称，理应在碑文上记为“东阿县某某香火社立”等字，而绝非仅仅用“东阿社”三个字表示。因此，“东阿社”当另有所指。

据《宋史》卷89〈地理志42·地理五·利州路〉记载：

天水军同下州，绍兴初，秦州入于金，分置南北天水县。十三年，隶成州，后以成纪之大平社、陇成之东阿社来属。嘉定元年升军，九年移于天水县旧治，仍置县一。（天水绍兴十五年度，成纪、陇西二县来入。）

这里的“东阿社”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上引文所言“陇成之东阿社”，陇、成是陕西秦凤路的陇州、成州，^④或者“东阿社”位于陇州、成州的接壤之地，或者“东阿社”曾先后隶属于陇州、成州，但都有些不通。根据上引文的末尾注释“成纪、陇西二县来入”，“陇成之东阿社”似乎应该理解为“陇西之东阿社”，“陇成”乃“陇西县”之误。这样来分析，“陇西东阿社”前往泰山进香祭拜碧霞元君时，曾立碑留念，从而有此立碑者是“东阿社”之碑。

另外，考虑到唐宋时陕西境内的元君庙这种情况已有很多，结合此碑文中还有“山西”二字，笔者怀疑这应是“陕西”的误写——不是原碑文有误，就可能是引用时的传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11《河南道六·郛州》，四库本。

^② [元]于钦：《齐乘》卷3《郡邑》。

^③ 雍正《山东通志》卷3《建置志》。

^④ 《宋史》卷87《地理志40·地理三·陕西·秦凤路》。

抄之误，或者“陇西之东阿社”不知何事提及了邻省“山西”，抑或“东阿社”就是位于陕西、山西的交界。陇西县的“东阿社”在陕西秦凤路，而前文的陕西西安府长安县的那座“在县北三十里冯党里，创自唐代”的元君庙，也在陕西秦凤路，那么这座元君庙似乎很可能就是碧霞元君之庙了。如果可以如此推测，那么碧霞元君信仰的发生发展年代显然可以上溯到唐代了。

至于香火社，较早的记载有：

……（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輿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①

释神凑，姓成氏，京兆蓝田人也。……元和十二年九月遘疾，二十六日俨然坐终于寺，……白乐天为典午于郡，相善。及终，悲悼作塔铭云：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惆怅随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②

一峰萧洒背城阴，碧瓦新堂地布金；……应似白莲香火社，不妨篮輶客追寻。^③

可见唐宋时“香火社”之称已普遍流行，“香火社”一词也未分开使用，也不简称之为“社”。此亦可佐证“东阿社”不是“东阿县香火社”的简称。

《东岳元君香火社碑》的立碑时间的“大宋辛酉岁”有三，一是宋太祖建隆二年辛酉（961），二是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三是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1081）。宋真宗改元“大中祥符元年”之后前往泰山封禅，大中祥符一共九年，天禧年号一共五年，这期间的14年就为碧霞元君信仰在民间的继续流传、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具备了更宽泛的发展空间，碧霞元君信仰从最初的局限于山东一地而扩展到广大的中西北地区。“香火社”一类的民间社团，不远万里的从陕西等地来到泰山进香并立碑，此碑应该是这时碧霞元君信仰在民间得到大发展的一个有力物证。

三、碧霞元君信仰的被正式认可

碧霞元君信仰虽然在民间一直呈上升发展的势头，但是官方对其态度却暧昧不清，因此这期间的碧霞元君信仰只是一种在民间较为流行但并未被官方正式认可的民间信仰。碧霞元君信仰被官方正式认可是在什么时间？无疑应该是从其封号最早得到官方认可的年代计算，此后其信仰才进入了合法化传播的历史阶段。但是，尽管当前学术界已经做出了大约在“明代前期”的论断，但究竟是在明代什么时间，又有些含糊不清。

一种民间信仰大致要经历产生、发展、消亡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加入一个环节，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产生——发展——**官方表态**——继续发展或者消亡。官方的态度，对于一种民间信仰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官方予以支持，

^①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四库本。

^②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16《明律篇第四之三·唐江州兴果寺神凑传》，四库本。

^③ [宋]曾巩：《元丰类稿》卷8《杂诗·寿圣院昌山主静轩》，四库本。

那么这种民间信仰会很快蓬勃发展兴旺起来；如果官方予以取缔，那么这种民间信仰也会很快走向消亡，即使能够苟延残喘，其影响也极其有限，除非它又获得了官方的许可及其他适合生长的新因素出现才能再度兴盛。此外，笔者认为还应该有第三种态度——官方不予表态，任其自生自灭；在这种官方态度之下，一些生命力旺盛的民间信仰方能以民间“私祀”的身份存在并继续发展。如明初规定，民间神祇凡是不在祀典之内的，有“淫祀”和“私祀”二种。“淫祀”是官方所不允许的，必须予以坚决打击和取缔。“私祀”则是介于在祀典和淫祀之间，官方对它既不扶持——除非发现支持它对现政权更有利，也不取缔——除非它对现政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碧霞元君信仰在其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之前，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私祀”的地位。

明代正德二年（1507），是碧霞元君信仰的“私祀”性质发生转变的关键一年。这一年的闰正月，武宗朱厚照派遣太监苗逵致祭之后，碧霞元君信仰才开始由纯粹的民间信仰转向为官方认可之下的民间信仰，并逐渐成为了专供帝王皇室贵族所信仰的神祇。泰安市文化局考古研究所的朱宏伟先生《一则珍贵的碧霞元君信仰史料》提到他们在2002年发现了一块正德二年的“御制告文”碑，碑文如下：

维正德二年岁次丁卯闰正月乙巳朔越十一日乙卯，皇帝谨遣御马监太监苗逵致祭于碧霞元君。曰：懿德含弘，仁慈广霈，佑苍生于寿域，故群品以霈衣，兹因眇躬偶爽调摄，敬祈圣力，永佑康宁。特以香帛，用申告祭，益张灵应，福佑家邦，谨告。

钦差巡抚山东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臣朱钦^①

… …

朱厚照在正德元年即位不久，即“以太监苗逵监督军务”。^②苗逵颇得帝宠，炙手可热，“中贵苗逵之势，颇能生杀人。”^③而朱厚照在即位的第二年，即派遣苗逵前往泰山“致祭于碧霞元君”，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苗逵的信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祭拜碧霞元君的郑重。立碑者排首是钦差大臣朱钦，字懋恭，邵武人，成化八年进士，弘治中迁山东副使，武宗即位后升任他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④之所以委派朱钦担任钦差大臣，而没有让其心腹太监苗逵担任，大概是考虑到祭拜碧霞元君礼节的正式性。因为若委派一个“刑余之人”担任钦差，就显得对祭拜碧霞元君不够尊重。因此苗逵可以监督军务，却不可以担任钦差行使祭拜碧霞元君的神圣典礼，甚至不能作为立碑者之一，这从侧面也可以说明朱厚照对祭拜碧霞元君的高度重视。这就是说，直到明代正德二年（1507），在民间已经是相当流行的碧霞元君信仰才开始正式被朝廷认可和崇奉，这一标志性的时间，应当是碧霞元君信仰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一个分界线。这很可能就是“碧霞元君”封号被朝廷首次认可的最早史实记载。换言之，碧霞元君信仰的正式认

^① 朱宏伟：《一则珍贵的碧霞元君信仰史料》，载《民俗研究》2004年3期。

^② 《明史》卷16〈本纪第十六·武宗〉。

^③ [明]孙绪：《沙溪集》卷11《杂著》，四库本。

^④ 《明史》卷186《朱钦传》。

可据此可以上溯至明正德二年。但是已被朝廷认可和崇奉的碧霞元君信仰，此后还是颇遭非难。据笔者查阅《明史》，发现有这样四则史料^①：

- 1、正德十一年（1516），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从镇守太监言也。[卷 81]
- 2、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鉴请收香钱为修缮费，天柱言：“祀典惟有东狱[岳]神，无所谓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礼，不可许。”[卷 188《石天柱传》]
- 3、万历二年（1574），慈圣太后立庙涿州，祀碧霞元君。部科臣执奏不从，参鲁斥其不经，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兴役浚河，鬻及妻子，陛下发帑治桥建庙已五万有奇，苟移振贫民，植福当更大。”亦不听。[卷 221《赵参鲁传》]
- 4、皇太后传谕发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庙，衡复争报闻。[卷 223《朱衡传》]

这四则史料，其实可以归纳为二层意思。一是说在正德十一年开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这一件事上，有赞成与反对两派意见。二是说万历二年皇太后发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庙，朱衡表示反对。

根据史料 1、2 可知，正德十一年开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的政府行为，毋庸置疑这是继明朝廷在正德二年公开承认“碧霞元君”其神其庙的合法社会地位之后，是对碧霞元君信仰合法性的再次确认。此时碧霞元君信仰虽然理应不再是“淫祀”，但是由于其并未被纳入祀典，因而身份十分尴尬，仍被视为“淫祀”，被指控为“不经”。如石天柱在正德十一年仍可根据碧霞元君不在祀典而指责碧霞元君信仰是“淫祀”，朱衡在万历二年仍可指控碧霞元君信仰为“不经”。

另外，从对史料 2 的分析还可以发现，正德十一年明政府开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说明碧霞元君再次得到明朝廷认可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如据记载：“[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自是遂为税额。万历中，岁入二万两。”^②而在万历二年“皇太后在涿州为碧霞元君立庙”，这充分说明碧霞元君信仰已经深入到皇室上层，明朝廷和皇室对碧霞元君的信仰由“借神收税”而主动“发帑金”为其建庙，公开崇奉碧霞元君，表明碧霞元君信仰已逐渐地得到明朝廷的支持。由此可见，碧霞元君信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若此后再称碧霞元君为“淫祀”云云就显然不妥了。而且可以进一步认为：朝廷的认可和崇奉，其效力并不亚于一纸敕封。如果说明代以前没有对泰山女神“碧霞元君”这一封号的明确敕封，那么明代正德二年之后，碧霞元君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封号，碧霞元君信仰就已经成为官方主导下的一种民间信仰。

（责任编辑 于 光）

^① 下引文载于《明史》的这四则史料，圆括号内的数字为公元纪年，方括号内的数字系笔者的卷数，均系笔者补加。

^②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 24《征榷考》，四库本。